

# 胡適批判的反思

• 胡 明

四十多年來「胡適批判」在大陸思想文化界波譎雲詭，氣象森嚴，喧騰得有聲有色。「主義」的興替，破立的利鈍，恩怨的消長，心理的陰晴把胡適的「問題」弄得既雲遮霧罩又曠日持久。文化圈裏的過來人都認作是一本傳統的折子戲：熟視無睹，絕少有人曾想到過它原是一台創新的「樣板戲」，給後來的人，後來的事留下無窮的榜樣——給後來的歷次政治文化運動的操作程式提供了新鮮而有效的經驗。

## 胡適不聽「勸歸」

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在「批胡」高潮的1954年11月8日對《光明日報》記者談話中曾說：「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其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在其奮鬥的「近三十年」中，確是「很少去碰過他」，即便到了1948年年底也還沒有想到去「碰他」，更沒有想到去「打倒他」，1948年12月25日宣布的戰犯名單中並無胡適，儘管當時胡適已正離北平十天。北平圍城時，中共的電台廣播專門有一個「對胡適之先生廣播」的特別節目，勸他不要逃離北平，更不要去外國，保證部隊進城後讓他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職務。胡適1949年4月離開中國，5月11日的《人民日報》就發表了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寫於4月29日)。這封信中陳垣說了三層話：(一)委婉地責備胡適在思想哲學上一直蒙蔽着他，在政治見解上向他作過錯誤的引導。(二)熱情地向胡適報告或者

說宣傳他在新的文化氛圍裏的切身感受，並性急地向胡適宣布他們的那些舊的科學的治學才法在立場上、方向上是「基本錯誤的」。(三)最後也是最要緊的結尾部分，恐怕也是陳垣寫此信的真正目的：「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甚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我現在很誠懇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信的最末一句話是：「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這封公開信當然可信為陳垣所寫，但也明顯是受了指示並接受了指示者的重要增刪。指示者與陳垣的目的顯然是統一的，應當說也是善意的：勸胡適回來，放棄以前的錯誤立場與成見，「翻然覺悟」，「轉向人民」，「人民」的行列正虛位以待。這個階段對胡適的政策是爭取他的回歸——大陸的門並未對胡適關閉。1950年1月9日胡適寫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信〉》，發表於《自由中國》卷2，3期，公開表示了拒絕的強硬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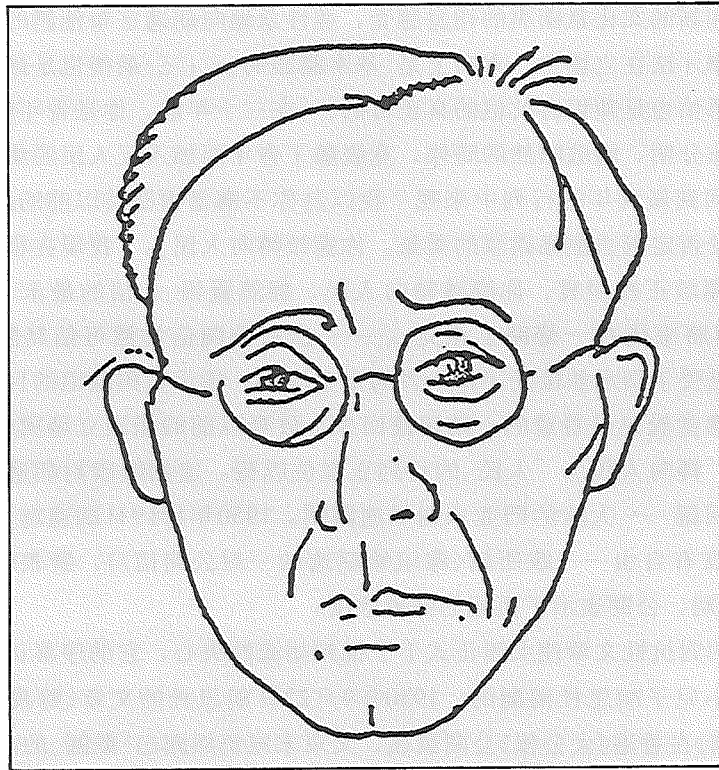
胡適的對抗性文章使大陸正式下了批判胡適的決心，它的序幕正是胡適留在北京的小兒子胡思杜揭開的。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香港《大公報》公開發表，文章末尾仍然露出「勸歸」的意圖：「對於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向人民低頭，回到人民懷抱裏來，人民是會原諒他的錯誤，並給以自新之路的。」10月胡適的重要反共文章〈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英文)在美國《外交季刊》上公開發表，對胡適爭取的希望最後破滅，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便不可避免了。不過，零星的、個別的親戚與朋友的書信勸歸行動卻並未完全絕迹，如1951年2月，1952年1月江澤涵給江冬秀的家信，如1957年3月曹聚仁給胡適本人的信。曹氏的信中明確勸胡適「最好能回北京看看，可以巡行全國。」他本人則願意「陪同」。——這封信的政策精神實際上一直到胡適逝世之前都有效。

1951年湯用彤、錢端升、金岳霖、蔣蔭恩、馬大猷、朱光潛、龔祥瑞、游國恩、梁思成、羅常培等人的文章，是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製造形勢、烘托氣象的，而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或者說核心任務則是批判胡適。

## 第一次批胡高潮

第一次「胡適批判」高潮是以「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的形式出現的。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正式成立，開展工作，同時配合北大、清華兩校(後加上燕京)院系調整，稍後又有「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運動」推波助瀾，呼應配合。1951年11月1日《光明日報》首先發表了掛銜「北京大學副校長」湯用彤的文章〈高等學校教師應抓緊時機積極學習〉，文章主要有兩層意思：(一)北大「為學術而學術」的口號甚為風行，「自由主義教育學說極為猖獗」。(二)「要改造學校首先必需教育工作者的自我改造」。11月6日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文章首先表示舊知識分子(比如他自己)的改造很不容易，繼而批評北大「長期自由散漫」基本上沒有得到糾正，並強調北大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和胡適要負主要責任，他們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錯誤教育思想長期保留在北大老一輩

胡適思想批判依照郭沫若(圖)擬定的九項內容，中國科學院和作協聯組了九個批判小組，向「胡適的幽靈」發起猛烈攻擊。



教師的頭腦中。因此他最後指出：「我們除了宣布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接着《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蔣蔭恩〈我要徹底改造我的思想〉、北大工學院院長馬大猷〈從我的思想談到北京大學的工作〉、北大西方語文系教授朱光潛〈最近學習中的幾點檢討〉、北大政治學系教授龔祥瑞〈徹底清算北大政治學系的教學思想〉、北大中文系教授游國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路〉、清華營建系主任梁思成〈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兼中文系教授羅常培〈我究竟站在甚麼立場為誰服務〉等文章。這些文章是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製造形勢、烘托氣象的，而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或者說核心任務則是批判胡適。

1951年11月12日起北京大學文法兩院開始討論對胡適的看法。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為誰服務問題認真擺了出來。羅常培、向達等十幾位老教授在檢討了自己的立場模糊、敵我不分、崇美親美、封建思想及濃厚的個人主義之後，「公認胡適是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大家在對胡適的出身成分、階級立場、白話文功過、創辦《努力》、《獨立評論》等的動機，直到他走上賣身投靠、認賊作父的末路為止都作了具體分析，又進一步認清了：不應是單純地批判胡適個人，而應該在北大和受過胡適影響的人身上搜尋胡適的影子。」——（當時新華社的一則電訊）。進入12月，學習改造運動逐步深入，宣布進入第二階段，即「研究文件，批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思想，劃清敵我」的階段（按「學習委員會」原擬計劃，學習改造運動有五個階段）。第二階段重點任務便是「控訴胡適」、「批判胡適」（偶爾也「批判梅貽琦」、

「檢討張伯苓」)，報刊配合發表了顧頡剛、朱光潛、沈尹默等人的重點發言與文章。

1951年11月開始的「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由於全國範圍的「三反」運動勃然興起而於1952年1月21日宣布暫停，原定的五個階段只部分完成第二階段的任務，以後的三個階段就擱下了，胡適思想批判也因此悄然而止。

## 第二次批胡高潮

第二次的胡適批判高潮是1954年11月開始的，它的觸機便是9、10月間的「《紅樓夢》事件」。兩個「小人物」向資產階級紅學權威俞平伯開火，而以《文藝報》、《光明日報》的主編們為代表的「大人物」卻「加以阻攔」。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投降派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於是一場「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迅速展開，鬥爭目標也迅速從俞平伯轉移到他的老師胡適頭上。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來說：「戰鬥的火力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文化學術界很快接到兩個動員令，一個是郭沫若11月8日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郭氏指出：「我們的文化學術界並不是天下太平，沒有甚麼問題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問題」。他強調當前這一場「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所有學術文化界的人「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但是郭沫若也強調了「自由的學術討論是非常必要的」，「要傾聽少數人的意見」，「允許少數人堅持自己的主張」。一個月後他的那篇叫做〈三點建議〉的發言中又重申了這個意見，可悲的是，「少數人的意見」，「少數人的主張」壓根就不曾出現過。另一個動員令是周揚的題名為〈我們必須戰鬥〉的長篇報告，在這篇向「文聯」和「作協」的領導成員做的動員報告中周揚為胡適的問題定了性：「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胡適思想在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佔有很大的地盤，不能設想不經過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具體問題上的徹底批判，唯心論思想可以自然消滅。」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行不止」，只有把胡適思想徹底的肅清，「才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學術界樹立真正的領導地位」。

一場「胡適思想批判」的大運動風雲緊湊，聲勢浩大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了。依照郭沫若擬定的「九項內容」，中國科學院與中國作家協會聯合組建了九個批判小組，全方位地向胡適思想或者說「胡適的幽靈」發起猛烈的攻擊。從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共編輯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的「論文匯編」八輯195萬9千字，加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批判資料集刊」、「批判文集」和其他小冊子（如姚蓬子的《批判胡適實用主義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以及大量未收入集冊的單篇批判文章，總字數當在300萬以上（含有大量重覆選編）。毋庸諱言，這300萬的批判文字從題目、論旨、觀點、材料、證例到文風、語式、習慣用詞雷同重

郭沫若也強調了「自由的學術討論是非常必要的」，「要傾聽少數人的意見」，「允許少數人堅持自己的主張」。可悲的是，「少數人的意見」，「少數人的主張」壓根就不曾出現過。

批判文章，總字數當在300萬以上，當然亦有少數學術性批判文章在立論上力求充分說理，慎思明辨，文風上也可以說是一絲不苟、嚴肅負責。

胡適批倒，緊接着的胡風捉拿，全國知識階層心態驟變，風聲肅然，圈子裏的人更是噤若寒蟬，談「胡」色變。

覆的很不少，操持剪刀漿糊，東拼西貼的更多。當然亦有少數學術性批判文章在立論上力求充分說理，慎思明辨，文風上也可以說是一絲不苟、嚴肅負責，如金岳霖〈批判實用主義者杜威的世界觀〉、孫定國〈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潘允中〈批判胡適的「吾我篇」和「爾汝篇」〉、陳煒謨〈論考據學在文學研究中的作用——兼評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考據學及其毒害〉、楊鍾健〈實用主義的生物學上的根據到底是甚麼〉、曹孚〈批判實驗主義教育學〉等。這些文章的作者主觀認識的自覺與學風文風的正派顯然是無可懷疑的，但就是這些代表相當批判水平與學術成就的文章表現出來的先驗的主觀武斷和形而上學的推演已經相當嚴重，馬列主義理解上的單純幼稚與運用上的教條僵化已經露出端倪。而其他大量一風吹，一邊倒、人云亦云的「大批判」文章則更是簡單化，片面化，所謂「形而上學猖獗」。——這種可怕的、災難性的文風實際上開拓了後來文化大革命中群眾性「革命大批判」的先河。而作為這種「革命大批判」最主要特色的政治上綱、學術失落，其始作俑者則往往是高級知識分子。例如：陸侃如的〈批判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載《光明日報》1955年5月15日）。

第二次胡適批判歷時十個月（1954年11月至1955年8月），胡適作為「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中國現代唯心主義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被告身份在大陸缺席審判。個人名譽、學術地位一落千丈，「當今孔子」終於被搞臭，尤其是在他原來活動頻繁的上層知識界。胡適批倒，緊接着的胡風捉拿，全國知識階層心態驟變，風聲肅然，圈子裏的人更是噤若寒蟬，談「胡」色變。從1957年反右開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大陸政治文化最劇烈動盪的二十年裏，胡適已是一只「死老虎」。大規模驚心動魄的「批胡」不搞了（大範圍的「重溫」胡適的書畢竟不符合當時現實階級鬥爭的需要），但為了肅清遺毒與積極防禦，「批胡」的常規節目仍在小範圍內繼續維持，如1958年4月26日《人民日報》有關「哲學教學要針對現實厚今薄古」的專論，如1958年五四前夕由中國哲學會和社科院哲學所聯合籌劃深入批判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再如1959年4月，曾出版八輯《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的「三聯書店」為配合「五四運動四十週年」又再選編出版了一個《論文選集》，以應讀者「繼續研究和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需要。其中除了增加兩篇新文章外，仍是以前八輯的陳貨。——1962年2月胡適逝世，大陸的批胡作業乃正式降下帷幕，胡適的「題目」宣布正式做完，蓋棺論定，遺臭萬年。在隨後爆發的十年「文革」中，官方文字絕少提到胡適，民間也大多不知有胡適。胡適的歷史批判任務已經完成，「批胡」創獲的經驗與鑄定的範式得以保留了下來並發揚光大，沉潛於每一個主動或被動參與文化批判的戰士的技術積累中，凝聚為一種精湛的鬥爭藝術和傳統的精神財富。

## 學術文化批判運動的楷模

我們已經對胡適批判運動的歷史作了一個輪廓的描繪，這個運動學術失落的實質已經暴露無遺。胡適三十年中涉獵的各文化學科，都留下了極待澄清的

大量毒素與惡劣影響。同時胡適自己弄出的所有學術成果也宣布為一無是處，「沒有絲毫學術價值可言」。三個最常用的形容詞是：「錯誤的」、「反動的」、「荒謬的」。難怪胡適嘲笑這些「清算胡適幽靈的出版品」，「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

我們的不少學者在很短的時間裏學會了一種先驗的、機械的思維模式：凡是政治上宣布為「反動」的學者：其學術必定是為反動的政治服務的，因而是一無是處的，其哲學基礎必是「唯心的」；因而是荒謬的、錯誤的、愚蠢的。這種形而上學的懶人思維在一些受過五四以來科學方法論訓練的學者是不屑一顧的，即便是為了偷懶或敷衍偶一用之，也是心中有愧的。但是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方向正確」等公開或暗示的贊許與慫恿之下，他們膽子漸漸壯大，因為根本沒有對手的回擊。觀點明知站不住也強裝站着：哪怕一戮即破也無所畏懼，因為決不會有人來戮。左顧右盼，皆行此術，聲色俱厲，理直氣壯。許多人不僅樂此不疲，而且愈演愈烈，愈演愈自如，愈演愈坦蕩。扭曲的心靈奔向集體無意識，文風、人格嚴重污染。

群起而攻之，搞臭一個人的批判機制決不能在學術科學上真正打倒胡適，反而為後來的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提供了一種技術的樣板，這種技術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得爐火純青，並成為我們百用不匱的傳統法寶。

當然，我們在看到對胡適的政治批判淹沒了學術是非的時候，還應該看到這是客觀上政治運作的必然邏輯，有其歷史的「合理性」。無產階級文化新道統、新體制、新規範、新權威的確立無疑要首先搬去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舊道統、舊體制、舊規範、舊權威，胡適正是這「四舊」的集中代表，他的思想與學術便理所當然地首先要成為一個靶子。被組織起來或禮遇邀來打靶的人不少以為只要靶打得穩、準、狠，打得賣力便可以得到身份的「改造」。當年一班老牌知識分子學者在搜羅肚中全部知識儲備，施出渾身上下功夫來批胡適時當然沒有想到自己也是「四舊」營壘裏的「歷史」人物，已經在等候被搬去或掃除的歷史命運了。

批胡運動是與當時整個政治經濟領域改造運動相配合的，旨在褫奪資產階級在精神文化領域上的傳統優勢並進而對之實行全面專政的第一個重大步署，以保證無產階級文化規範建構上的高速度、高效益。在文化範式人工轉換一點上，批胡運動與以後的歷次文化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是是一脈相承的，技術上是塊樣板，只不過操作的人一茬換一茬而已。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文化大革命運動又正是以批胡運動為序幕的：規模愈演愈大，烈度愈演愈高而已。

## 問題還未解決

1976年文化大革命嘎然而止，歷史合上了沉重的一頁。萬民歡騰的同時神州大地滾過了「第二次解放」的春雷，思想解放、哲學解放、文化解放伴隨着人的解放、牛鬼蛇神的解放。1979年「五四」六十週年前夕，胡適的歷史存在以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也被少數學者大膽地提了出來，政治局面的寬鬆、

不少學者在很短的時間裏學會了一種先驗的、機械的思維模式：凡是政治上宣布為「反動」的學者；其學術必定是為反動的政治服務的，因而是一無是處的，其哲學基礎必是「唯心的」；因而是荒謬的、錯誤的、愚蠢的。

群起而攻之，搞臭一個人的批判機制，決不能在學術科學上真正打倒胡適，反而為後來的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提供了一種技術的樣板，這種技術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得爐火純青，並成為我們百用不匱的傳統法寶。

對歷次政治文化運動的反撥以及思想解放的巨潮激盪，大陸終於出現了三十年來第一批比較客觀（所謂用兩分法）評價胡適的文章。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嘗試集》、《逼上梁山》、《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又成了學術界的話題。八十年代中期胡適研究還一度相當活躍，當時中央負責同志在內部號召研究兩個人——胡適與孫中山，着眼於兩個人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光明日報》破例連載〈胡適傳〉，電視上也允許播放《胡適的故鄉》之類的文化風光片。一批觀點上小心翼翼的研究評論之作相繼發表，胡適的書大量重印，1989年「五四」七十週年前夕，要求重新評價的呼聲達到了高潮。——新時期的十年中，胡適的「問題」幾起幾落，吳晗與三家村平反了，俞平伯恢復名譽了，胡風冤獄昭雪了，甚至連武訓都重新肯定了，右派分子胡思杜也改正了，可是胡適的「案」還堅封在歷史櫥櫃裏，沒有了結的時間表。「問題」還被擱着，《胡適文存》重印的批示下達了又收了回去，「胡適」又退回到冷宮，為胡適翻案成了畏途。當然學術上，以前批得體無完膚的學術則已經允許謹慎與低調的評論與研究了。學術史上重新有了胡適的名字與位置。但胡適在文化階層的陌生度已經大得驚人，以至於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中竟把當時只有三十週歲風度翩翩的胡適弄成了一個六十餘歲的糟老頭。

胡適「問題」解決的顧慮與猶豫無非基於兩重原因：歷史的和現實的。所謂歷史的，當然是恩怨未盡，偏見難消。1919年「問題與主義」之爭；1922年發起〈我們的政治主張〉，鼓吹「好人政府」，以及稍後一點的「聯省自治」問題的辯駁和〈國際的中國〉一文對中共政治綱領的攻擊；1923年科學人生觀引發出來的「最後之因」、「根本解決」即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論爭；1930年〈我們走哪條路〉提出「五鬼鬧中華」以及〈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關於「牽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漢」的



四十多年來，「胡適批判」在大陸給後來的人、後來的事留下無窮的榜樣——給後來的歷次政治文化運動的操作程式提供了新鮮而有效的經驗。

「惡毒政擊」；1932年以後《獨立評論》的政治方向，抗戰勝利後因「感念舊好」致毛澤東信函提出要他放棄武裝的「懇切」的「鄙見」，再就是參加「國民大會」，為國民黨行憲捧場，到變為頭等戰犯，又不聽勸阻逃亡以及逃亡後的頑固僵硬的 political 立場。——這一切固然可以為胡適蓋棺定論，歷史已經鑄定了胡適一以貫之的政治立場與抗拒態度。這一點當然不可逆轉，但還是可以淡忘，可以寬恕，可以諒解——如果僅僅是歷史問題。

歷史的問題都好說，都說得清楚，都可以攤開來說。但胡適的問題卻諱莫如深，不好說，不便說清楚，也攤不開來說。我們這邊的知識分子，無論高級的、中級的還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莘莘學子，似乎都不能主動有效地防範按常規來說應該過時失效的胡適思想的侵害與腐蝕。胡適那一套五四精神遺產即便在號召思想進一步解放的大潮中尚且感到有些微扞格。1986年有人慧眼能識得胡適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但終經不住四周新騰起的疑雲迷霧而心虛退卻了。

胡適為現代中國的民主、科學為核心的新文化事業鞠躬盡瘁。作為舊時代最後一位送葬者與新時代最初一位先知，他註定要被新舊兩個時代的人誤解與曲解。

1991年10月 北京

歷史已經鑄定了胡適一以貫之的政治立場與抗拒態度。這一點當然不可逆轉，但還是可以淡忘，可以寬恕，可以諒解——如果僅僅是歷史問題。

胡 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 討論摘刊

李金強(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 批胡的文章裏，學術水平較高的應予特別注意。馬克思史學畢竟是今日史學流派中的重要一支，而胡適受中國大陸批判的時候正值馬克思史學上台之際，其中的嚴謹之作是應予重視的。

耿雲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大批判其實不是新近發明的，在中國這是源遠流長的。

劉述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大批判在中國源遠流長，可是與今日不同之處，在於現在有強大的「政權」。